

·新 论·

# 应对风险社会:教育的顺应与变革

余秀兰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当代风险社会是工业和科学技术不受控制发展的结果,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还是一种文化的概念。面对风险社会,应该具备风险意识,变革教育。教育需要从传授确定价值观和知识,转变到培养质疑、判断和选择能力;从培养规定角色的社会人,转到培养人的应变能力;从培养掌握专门知识和技能的经

济人,转为培养有责任伦理的高素质公民;从为国家培养人才,到培养能够“全球性思考和行动”的人。

**关键词:**风险社会;教育功能;教育变革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4-0005-06

## Responding to Risk Society: Adaptation and Reform in Education

YU Xiu-l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 contemporary Risk Society is created by the rapid and no-controlling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s also appear in other area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In the face of a Risk Society, people should be aware of social risk, and reform educational purposes accordingly. Education should teach students how to question authorities, to make a judgment or a choice rather than providing them with fixed values and knowledge, should develop students'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rather than producing prescribed socialized-people. Education should also change from training students to be economic individuals to educating them to be active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hips, from teaching students learning for a local or a nation to learning and action for all.

**Key words:** Risk society; Educational function; Educational reform

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人们能够适应社会、贡献社会。不同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自然不一样。在一个多变的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环境,教育应该何为?

### 一、风险社会的来临

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首次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在“切尔诺贝利事件”、“疯牛病”、“9·11事件”等危机不断困扰人类并为社会大众切实感受后,风险社会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话题。

在贝克等学者看来,虽然风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伴随物,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

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sup>[1]</sup>吉登斯把这种风险称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人为风险”,以区分于传统的自然的“外部风险”。故现代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而且往往超出了人们的预测和控制能力。

风险社会首先是现代化的后果,工业和科学技术的不受控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正如贝克所言,“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我们当今时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sup>[2]</sup>也就是说,当科学技术不受控制地发展并被非理性地使用时,当决策者处于“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时,当社会体制和公共机构的功

能缺失时,社会风险便产生了。

其次,风险问题不仅仅是工业和技术的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重叠在一起”。<sup>[13]</sup>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斯德认为,除了自然风险外,即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效应所酿成的风险,还有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社会结构方面所酿成的风险,如人类暴力和暴行(犯罪、战争)所造成的风险;经济风险指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或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sup>[14]</sup>各种社会风险还改变了社会结构,如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结构性特征是“个性化”,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支持网络,需要自己决策,“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威胁和矛盾等原本可以在家族和村社中或通过求助于社会阶级或社会团体而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地由个人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sup>[15]</sup>

再次,风险还是主观感受和社会建构而成的。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斯德等认为,在当代社会,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风险可能并没有加剧,但人们的认识程度提高了,被人们觉察、意识到的风险增多了、加剧了。<sup>[16]</sup>吉登斯也提到,同以前存在的社会秩序形式相比,一个风险社会内在的危险性或危害性并不更大,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风险文化’之中”,“各种变革引导或迫使我们越来越多地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我们越是就未来事件作出积极的决策,人们越是要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sup>[17]</sup>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强化了风险因素,如风险传递手段的全球化、信息化。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社会的各个部分是分散和孤立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变迁是缓慢的,因此可以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的力量,强制性地恢复或维持秩序。但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的发展,使信息与风险的传播不再可控。如互联网的普及,能使发生在一个小地方的事情迅速传遍全世界,由于很多参与传播者都是“缺场者”,事件很容易被夸大甚至随意建构,风险因此被传播、扩散和放大。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现代化的发展有赖于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空结构,即现代化的扩散已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和事件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遥远的事件和行动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还不断增大。”<sup>[18]</sup>时间和空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分离出来,联系由传统的“在场”转变为“缺场”,处于分离和缺场状态下的人们只能依靠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获得信息,达成共识,但如果提供

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社会就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由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混乱和风险之中。

## 二、中国社会的风险因素和风险意识

既然风险社会是过度现代化的后果,是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地发展的结果,那么风险社会是否仅是发达国家的处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因为主要任务是生存与发展问题,是现代化问题,是否就没有风险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贝克指出,有三个层面的风险可能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得以确认,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sup>[19]</sup>这三类风险在我国都会遇到。

首先,科学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增加的汽车、电器使用量,客观上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帮凶;更有一些企业为追求利润,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的健康、生命,而且这些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如2008年的河北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湖南浏阳的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的铅污染事件、山东临沂和江苏盐城的水污染事件等。据国家环境部的《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8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保护部直接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155起,比上年增长22.7%,其中重大环境事件12起,比上年增加4起。<sup>[20]</sup>

其次,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危险,我们也已感受到。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并迅速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已切实影响到我国经济 and 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对沿海一带的出口企业影响较大。

第三,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带来的危险也已显现。近年来身处国外的“藏独”和“疆独”头目发起的西藏和新疆暴乱,使我们体会到贝克所说话语的意义:“当前来自潜藏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网络所带来的跨国界的威胁将对全球各国政府构成挑战。”<sup>[21]</sup>

此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除了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面临贝克所说的三类风险外,还有自身的一些危机与风险:一是很多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冰雪、地震、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依然会给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其次,转型期和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公平问题、诚信危机等,使各种社会矛盾与不安全因素叠加,也扩大了社会风险。

以上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一个社会风险的高发期。正如贝克所说:“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进一步加

强,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与西方市场经济上百年的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sup>[9]</sup>

事实上,不仅客观的风险增多,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有更强的风险意识。正如风险社会理论家所言的,风险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它表明人们的反思性正在增强,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的反映,“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一个社会越是寻求生活在未来之中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概念就越普及。”<sup>[6]96</sup>

### 三、风险社会理论对思考教育问题的启示

风险社会理论产生于对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中,这一理论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思考教育问题最有启发性的有二点:

第一,风险社会理论从未来视角思考问题,对未发生的问题进行预测与防范。贝克说,风险是指充满危险的未来,由于预测未来,从而影响当前行为:“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sup>[11]</sup>吉登斯说:“风险理念与实施控制的抱负,特别是与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sup>[6]93</sup>

第二,风险社会理论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人们对现代社会原有的发展的确定性,对科学及科学家的信任开始质疑。拉什认为,风险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化上“自省和反思”的特征。贝克认为,“在世界风险社会,控制逻辑从根本上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社会可以变成自我批判的社会的一个原因。”<sup>[10]</sup>

这些都为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教育是一个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事业,需要从未来的角度考虑问题,需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教育也需要有反思性,教育需要考虑社会的需求,需要考虑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特点与需求,所以教育内容与方法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有反思与质疑的精神;特别是面临一个失控、多变的风险社会,教育更需要反思,更需要考虑如何去应对。

### 四、风险社会下的教育诉求

培养适应于社会需求的人,是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那么,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教育应如何转变和

应对呢?

1.从传授确定价值观和知识,到培养质疑、判断和选择能力

教育是传输价值观和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社会发展相对有规律,科学与专家象征着权威。据贝克的观点,工业社会是一个信任社会,表现为对“社会体系的信任”,对各行各业的“专家体系”的充分信任。<sup>[9]</sup>在这样的社会中,是可以通过教育传授既定价值观和知识的。但在风险社会,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越常规性,知识和专家都变得不再确定。<sup>[9]</sup>而且,在这样一个市场化、个体化的社会,面对过度的、失控的信息,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与矛盾,人们不能再以阶级、家庭等其他制度性的东西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物,需要自己去判断、抉择,原来程序化、标准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自助生活、自反性生活。所以,教育也要作相应的变革。

首先,教育要培养学生质疑权威知识和专家的精神与能力。英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如全国课程委员会(the National Curriculum Council)1993年声明: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去质疑科学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手段这种时常被夸大的绝对正确性的观点,以及被同样夸大的神学和哲学的不充分性的观点。”学校课程和评估机构(the Schools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1995年进一步发展了该观点,他们宣称“把科学看作理解经验的唯一途径,与启蒙的人文主义一起,要为课程的精神和道德层面衰落负主要责任。”所以,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是有限的,学校要发展科学行动能力,要使人们成为风险社会中有能力的、有责任的参与者,课程对此需要有所反映,课程要有这样的道德责任。<sup>[11]</sup>

怀疑不同于无知,而是来源于更多的知识。如一个学生因为看了更多的书而不信任教师的话,表明他已不仅仅依赖于专家的身份与权威,而与其他方式、其他知识结合起来判断专家知识。所以反而要有更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识别和防范风险。现代风险对知识具有依赖性,而且由于高度精细的分工,风险常常是多种系统的共同结果,是一种“组织化的不负责任”,故普通人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法识别与判断很多风险。贝尔说,如果在某一领域,技术的垄断已经成为一种可以用来掩藏社会变革并阻碍社会发展的垄断,那么这种垄断状况势必导致一系列问题。所以要打破专家的技术垄断,要进行权力的分解,一方面要让更多的科学技术专家了解情况,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技术领域以外的社会公众也有对技术权威进行怀疑与

质询的自由,有能力和能力对风险作出自己的鉴别与解释。只有公众对科学的相关知识及其不确定性有了普遍的认知,人们才能越过技术时代的重重藩篱,艰难地踏上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民主化与生态民主化进程。<sup>[12]</sup>教育便负有让更多的人具备质疑权威能力的责任。

其次,质疑之后更重要的是判断与选择。科学不再是真理,专家不再是权威,多元的信息常常使人变得异常恐惧、敏感、焦虑,并无所适从。如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引发人们对地球、环境的恐惧,每每出现一些稍微异常的现象如动物成批地搬迁、“天坑”或地陷的出现、气候的异常,都会引起人们诸多的猜疑和讨论,“2012”的预言似乎就要实现。这种情况下,教育要有责任排除人们对风险本身的恐惧。质疑不是不相信一切,不是导致不可知论,而是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经过自己认真的思考和判断,怀疑值得怀疑的,相信可以相信的。所以,质疑之后的判断与选择更重要,教育要赋予人们这种能力。有了这种判断与选择能力,才能在这个信息失控、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有信心、并理性地生活,所以教育要有责任使紧张不安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 2. 从培养规定角色的社会人,到培养人的应变能力

使学生具备未来社会角色所需要的规范、知识和技能,是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迪尔凯姆指出,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年轻一代“社会化”,是成人施加在尚未准备好可以应付社会生活者之上的一种影响。帕森斯也认为,教育通过社会化功能,可以为社会培养具有共同价值与信念以及适当工作能力的人才,从而促成社会的统整与发展。也就是说,教育制度是要通过一定的标准化来培养人,要使学生适应预先确定的标准、规范、尺度和模式。

但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社会化则意味着教育要培养适应风险社会的品质。因为未来不再确定不变,生活可能充满风险;因为生活在风险社会中不仅需要掌握知识,还要面对各种问题与矛盾,能够判断、选择与决定。所以要培养学生灵活应变的能力,特别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应变危机的能力。

首先,面对多样复杂的风险社会,对人的培养要强调适应性和变通能力。微软系统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兼容性”很强,能够在各种硬件条件下运用。面对多样复杂的风险社会,对人的培养也要强调“兼容性”和适应性。教育经济学家莱文指出,服务于一个稳定环境的教育和服务一个变化着环境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多变的社会,教育要培养适应变化的创造能力,要将以记忆、考试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转变

成注重适应变化能力的培养。<sup>[13]</sup>

其次,在危机多发的风险社会,教育要特别注重培养人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风险是难以预测和不可控的,所以面对风险的应变能力尤其重要。如面临地震、洪水等突发性自然灾害,面临校园暴力和社会暴力,面临经济危机而突然导致的失业,人们该如何应对,教育有责任培养人们应对这些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而要培养这种应变能力,必须革新教育本身。有学者称,要培养学生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在处理社会事宜时根据经验和反省做到深思熟虑。要发展这种能力,学习者要从教学情境的活动中获得经验,传统的班级安排、学习科目都要调整,最好采取问题型教学模式,遵循四条原则:可仿效性原则、方法原则、行动导向原则以及课程学习与社会学习相结合的原则。<sup>[14]</sup>从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实际来看,可以在课程规划与设置上关注应变能力的培养;还可以在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开展一些模拟风险发生状况的情境教学,如地震发生时如何自救与救人,校园暴力发生时如何有效逃生等。

## 3. 教育从培养掌握专门知识的经济人,转为培养有“责任伦理”的高素质的公民

在工业社会中,教育的主流话语是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培养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人力资本理论是这种教育理念的理论基础。但在风险社会,这种教育理念已不足够,教育要从传授知识的智力教育,转向特别关注责任伦理的综合素质教育;从培养有竞争能力的经济人,转向培养关心他人和社会的有责任感的高素质公民。

首先,教育要使人们具有风险伦理和责任伦理。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不负责任的决策导致的,所以特别要强调责任伦理。贝克认为,每一个个体、团体、政府及其他相关组织都应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后果,责任需要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要唤醒人们的责任意识,“每个人在实施行为之前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美好远景的预期,而是行为的风险及后果,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sup>[15]</sup>因而,风险社会中的教育除了要传授知识外,还要培育责任伦理意识,引导人们以“责任原则”衡量自己的行为,为他人、社会以及下一代负责。

其次,教育要唤起人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责任感。在风险社会中,许多问题具有多面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决策不能也不应该由科学家单独完成,而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做决策。科技领域之外的一些知识得到了承认,公众和科技专家一起参与到讨论中来,学者们称之为“亚政治”或“次政治”。贝

尔指出,要营造一个公共领域。只有一个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点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拉什也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努力用诸如环境保护运动、绿色和平运动之类的亚政治运动形式去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风险社会之中。”<sup>[15]</sup>这就是说,风险社会要求公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各样的参与模式是应对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方法。当今社会,自愿性组织越来越多,这些人来自不同领域,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共同的责任和公众利益,如环境、不公正、贫穷等,走到了一起,表达他们的声音,以影响决策。这样,就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提出,要使教育重新回归到社会行动、改造社会的轨道上来。<sup>[16]</sup>

第三,教育还要鼓励人们关注、帮助弱势群体。风险社会不仅要求我们要理解和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参与到集体的决策中,还要求能够帮助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控制其环境的弱势群体。因为有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也更有能力去帮助他人,采取有效的行动,并影响决策。

而要达到以上的目标,教育要培养哪些具体能力?有学者认为,要进行全民素质教育,它包含三种能力的培养:自我决定、对社会的积极参与、帮助那些没有自我决定和参与社会能力的人。<sup>[14]</sup>另有学者称,在风险社会中,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 Allgmeinbildung 的能力。所谓 Allgmeinbildung,大致可理解为综合性市民(general citizenry)或综合的素养(general literacy),包括自我决定的能力、建设性地参与社会的能力、团结的能力。<sup>[17]</sup>还有学者提出,风险社会的公民要是包容性公民、多元性(多才能)的公民、反思性的公民及积极主动的公民,教育要以此为目标。<sup>[18]</sup>贝尔也指出教育要“放宽或取消对劳动岗位和职业的定向培养,取而代之以提高综合素质为培养宗旨”,综合素质不仅仅是我们以前说的“灵活性”或“终身学习”,还包括社会行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冲突能力、文化理解力、综合思维力以及应对社会不稳定与矛盾的能力。<sup>[19][41]</sup>

4.教育从为国家培养人才,到培养能够“全球性思考和行动”的人

过去,我们主张教育要为国家培养人才,但在风险社会中,教育显然不能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之内了。因为风险是全球性的,是不分等级、区域和国界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金融危机、恐怖活动都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事。正如贝克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风险如工业化对大自然的破坏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使不同制度和地区的国家“共处同一条船上,吞噬着同一种恶果,承受着同一种命运”。<sup>[20]</sup>我们正处

于一个疆界消逝的风险社会,所以教育也要从关注地方文化、经济,转到关注公共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利益、全球的利益。教育要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地球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保护地球的责任。有学者提出,要培养包容性公民,要能够全球性思考。为成为包容性公民,教育学生要为了整体而学(learning for all),要关注整体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狭隘的地方文化,关注公共的利益而不是地方的利益。<sup>[18]</sup>

风险的全球化还要求人们具有处理跨文化矛盾的能力,贝尔特别指出应对风险全球化,教育政策上的新导向是要增加教育和科研投资,教育“要帮助学生认识并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和冲突”;要使人们“能够在世界社会中面对各种跨国间形势和矛盾时都能应对自如”。<sup>[19][41]</sup>

风险的治理也不是哪一个国家所能胜任的,必须建立相互合作的共同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一些跨国组织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如国家环保组织、国际反恐组织等。贝尔说,而在个风险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由于对共同风险的恐惧心理而不断走向联合:“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成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sup>[19]</sup>教育要能培养这样具有国际沟通和合作能力的人。

总之,我们已从工业社会迈向风险社会,生活在“风险文化”之中的我们,要以积极的风险意识重新思考和设计教育;我们的教育不仅要使人们具有应对风险社会的意识和能力,还要有减缓风险、消除紧张、在风险社会中建立秩序与和谐的道德责任。

### 参考文献

- [1][德] 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8.
- [2]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
- [3]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87.
- [4]转引[英]自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 [5][德] 乌尔里希·贝克.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M]//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经济与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
- [7][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新华出版社,2001.
- [8]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0-01-20]. <http://www.sepa.gov.cn/plan/zkgb/2008zkgb/index.htm>.
- [9]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 (下转第14页)

掘人类的创造潜能。因为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只有容许学术自由,学者的知性品格才能受到尊重及保护。

#### 四、结语

科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的自由探索真理的精神。“五四”以来,“科学”观念已深入国人之心。然而,在科学精神方面,即知识共同体对理性的至上强调,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以及学者对自身使命的认定和高度自觉,我们仍还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从当今中国教育的实际看,我们面临的科学启蒙的任务依然是任重道远。我们理解科学,传播科学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最根本的是要在我们民族中培养起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萌发出来的热爱真理、追求知识的求真态度,让他们的精神境界超乎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

总之,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多倡导一些“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理想主义是绝对必要的。科学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为国家科学

创新能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要为国家培养出顶尖的科学人才,不论是培养人才的教师,还是被培养的学生,理想主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 参考文献

-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00.
- [4]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 Project 2061, 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R]. AAAS Publication, 1989:25-31.
- [5]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13.
- [6]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1999(1).
- [7]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17.

收稿日期:2010-04-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中国大学科学原创力的学术生态研究”阶段成果(课题批准号: BIA080036)。

作者简介:吴海江,1961年生,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科学的文化研究、大学学术生态。

#### (上接第9页)

- 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 [10][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再思考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4).
  - [11]Martin Ashley. Science: an unreliable friend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0, 6(3): 269-280.
  - [12][德]乌尔里希·贝尔.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 [13]Henry M Levin. 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Change [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Series: Occasional Paper No.15, 1998.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fed.cuhk.edu.hk/hkier/content/document/publications/occasional/index\\_policy.htm](http://www.fed.cuhk.edu.hk/hkier/content/document/publications/occasional/index_policy.htm))
  - [14][丹]斯特芬·埃尔摩斯, [加]沃尔夫·迈克尔·罗斯.全民素质教育: 为风险社会做准备[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6).
  - [15][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4).
  - [16]Jane Thompson. Changing ideas and beliefs in lifelong learning? [G]Aspin D N (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Lifelong Learning.

Spinger 2007.

- [17]Steffen Elmose and Wolff -Michael Roth. Allgemeinbildung: readiness for living in risk society [J]. J.Curriculum Studies, 2005, 37(1):11-34.
- [18]Rennie Johnston. Adult learning for citizenship: toward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purpose tradi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1999, 18(3): 175-195.
- [19][德]乌尔里希·贝尔.什么是全球化? [M].常和芳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0][德]乌尔里希·贝尔.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

收稿日期:2010-02-23

基金项目:本文是童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与应急管理体系”(06&ZD02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余秀兰,女,1969年生,安徽涇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社会学。